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23期(民國113年3月),47-8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北平的黨務紛爭:以市黨部為中心的考察(1928-1929)*

王建偉**

摘　要

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北平市黨部主要脫胎於國民黨在華北祕密活動時期的幾個「小組織」,呈現出比較濃厚的地方性特徵。九位黨務指導委員雖在形式上經過了上級任命,但與中央黨部淵源不深,關係疏離。市黨部自公開之日起就因黨員登記、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人選等問題,對抗中央,多次爆發風潮。改組派乘機攪局,推波助瀾,進一步加劇了北平黨務亂象。蔣介石對此早有關注,主動出擊,逐步收攏北平地方黨部的人事主導權,丁惟汾、閻錫山、陳果夫等人深度牽涉其中,線索紛繁。北平的黨務紛爭不只是北平一地的問題,反映了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對華北地區的統治形態與執政基礎。

關鍵詞: 國民黨北平特別市黨部、丁惟汾、改組派、小組織

---

*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5月15日。
**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一、引　言

1928 年 6 月，南京國民政府確立了對北平的統治，國民黨成爲執政黨，北平市黨部從「地下」走向「前臺」，正式躍居地方行政體系之中，這既是國民黨「黨治」政權向基層社會的浸透，也是北平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新現象。[1]理論上，市黨部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北平的直屬機構，是將黨務嵌入北平社會的重要組織載體，但實際情況並不如此。市黨部不僅因內部派別鬥爭而陷入分裂，與中央也因黨員登記、指導委員任命等問題陷入持續拉鋸，其激進的行事風格並不符合國民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型要求。改組派也混雜其間，與南京中央大唱反調。蔣介石依託北平的實際控制者閻錫山的有限度配合，兩次調撤指導委員，徹底改組北平市黨部，將地方黨務權力逐步收歸中央。

對於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各地的黨務狀況，學界對江蘇、浙江、上海等地關注更多。這些地區是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核心區域，國民黨政權根基較深，控制相對強固，地方黨組織建設也更加完善。對於北平這類國民黨實施名義統治，但受地方實力派實際控制的非核心區域，相關成果偏少，且主要以民眾運動爲切入點，聚焦於黨部、政府、商界之間的複雜關係，對北平市黨部的其他活動以及北平黨務的整體面貌著墨不多。[2]

1　1928 年 6 月國民革命軍接收北京之後，北京改稱北平，北京特別市黨部也隨之更名爲北平特別市黨部，本文簡稱「北平市黨部」或「市黨部」。關於這一機構的檔案散佚較多，但同期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主要報刊留下了較多北平市黨部的相關報導與原始紀錄，部分黨部文件、宣言等也在報刊中原樣刊發，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由於原始檔案缺失導致的遺憾。通過對各種來源、立場的報刊史料的爬梳，輔以留存下來的部分公文等，結合臺北國史館館藏的蔣介石、閻錫山等人的部分往來函電，比照相關當事人留下的回憶性質的文字，大致能夠勾畫出北平市黨部建立初期的基本面貌與主要活動。不過，本文在行文過程中將始終對報刊資料呈現歷史事實的限度保持自覺認識。

2　參見周斌，〈1928 至 1929 年的反日會〉，《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頁 145-185；齊春風，〈北平黨政商與濟南慘案後的反日運動〉，《歷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頁 81-103；張皓，〈北平臨時分會的設置與撤銷：國民黨各派對華北的角逐〉，《晉陽學刊》，2011 年第 5 期，頁 98-105；杜麗紅，〈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北平工潮與國民黨的蛻變〉，《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頁 60-78。

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影響北平政局的關鍵因素是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等人在政治、軍事領域的激烈博奕，黨部能夠主導的事務比較有限，承擔的戲份比較輕。但國民黨作爲執政黨，黨部成爲地方一級行政系統，畢竟是北平歷史上的第一次，由此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本文在以往學術史基礎上，重點關注市黨部公開活動之初的內部糾紛以及與中央政府的對抗，通過梳理蔣介石與丁惟汾、閻錫山等人的關係網絡，挖掘北平黨務亂象背後涉及的地方與中央角力、派系糾葛以及黨政關係，努力呈現市黨部在北平地方行政系統中的準確位置，藉此返觀國民黨政權統治北平初期的統治樣貌與滲透程度。

二、國民黨北平黨務：從祕密走向公開

在中國國民黨早期的發展歷程中，主要立足於南方，以長江、珠江流域爲活動基地。北京作爲國都所在，控制森嚴，國民黨只有零星活動，投入的力量比較有限。民國建立之後，國民黨在北京政府國會內部一度比較活躍，但並未向基層社會延伸。進入 1920 年代之後，孫中山調整革命方略，一方面主動向北方拓展，另一方面確立國共合作政策，通過與共產黨人相互協作，國民黨在北方的活動漸有起色。

1924 年 1 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在上海、北京、漢口等地組建中央執行委員會派出執行部，李大釗與丁惟汾、王法勤等人共同負責北京執行部的籌建工作。同年 4 月 20 日，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成立，成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北京的執行機關，直轄北京、直隸、山東、河南等 15 個省區，領導成員有李大釗、石瑛、于樹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圖等人。[3] 以此爲標誌，國民黨在北方的組織框架初步搭建。

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建立之後，逐步建立基層組織。1924 年 7 月 14 日，丁惟汾與于樹德以北京執行部常務委員身分召集選舉，成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

3 〈北京執行部報告書〉，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秘書處，《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日刊》，號 10（1926 年 1 月），頁 10-11。

黨部，內設祕書處以及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農民部、青年部、調查部、婦女部，于樹德擔任主要負責人。[4]北京特別市黨部直接受北京執行部領導，二者在同一地點辦公。1924 年 10 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之後，孫中山北上入京，顯著提升了國民黨在北方地區的影響力，帶動了青年學生的入黨熱潮。據報導，截至 1925 年 3 月，國民黨北京黨員人數驟增，其中各大學學生約佔「十分之六七」。[5]于樹德後來稱：「北方自從總理北上以後，北方群眾漸漸了解本黨，漸漸熱烈的參加國民革命的工作。所以說總理北上以後，對於政治上雖然沒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喚起北方國民革命的要求，其影響實在深刻了。」[6]至 1926 年初國民黨「二大」召開之際，在北京填報志願書的國民黨黨員人數約爲四千人，已領黨證者爲兩千六百餘人。[7]

國民黨在北京拓展黨務的同時，內部裂痕也進一步放大。這一時期，國民黨在北京的組織架構比較混亂，但有一條相對清晰的線索貫穿其中，即「左右之爭」。左派主要集中在國民黨北京執行部與北京特別市黨部，右派則以民治主義同志會以及後來在此基礎上成立的孫文主義學會爲代表。相互之間立場各異，感情對立，衝突不斷。總體而言，以李大釗、丁惟汾爲代表的左派佔據優勢，國民黨北京黨務呈現比較鮮明的「左派」特徵；但右派勢力在西山會議派的幕後支援下，聲勢與規模亦不可忽視。雙方爲北京黨務的主導權展開了激烈爭奪。

雖然國民黨北京組織系統呈現分裂狀態，但雙方對「革命」的基本認知與做法差異不大，即大力吸收學生黨員，發動民眾運動，進行組織擴張。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學生作爲一股新勢力在北京崛起，政治運動爲學生群體提供了一個新的通道與出口，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以及國民黨的

4 丁爻，〈丁惟汾先生大事年表〉，收入葉飛鴻主編（下略），《丁惟汾先生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2014），〈附錄一〉，頁 3394。

5 〈國民黨員驟增〉，《順天時報》，1925 年 3 月 30 日，第 7 版。

6 〈于樹德同志報告北方政治狀況〉（1926 年 1 月 6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上冊，頁 203。

7 〈郭春濤同志北京特別市黨部黨務報告〉（1926 年 1 月 11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頁 245-246。

改組爲他們提供了新的結盟對象，二者彼此藉助。國民黨的方略是選擇那些已有一定基礎的學生團體統一入黨。正是因爲學生群體的廣泛參與，國民黨在北京的組織系統才能在較短時間內迅速壯大。[8]不過，黨員來源過於單一，也造成國民黨在北京的社會基礎單薄，相應弊端逐漸顯現。

1926 年「三．一八」慘案發生之後，北京的政治環境持續收緊，國民黨北京市黨部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原俄國兵營內。段祺瑞執政府倒臺後，張作霖入主北洋中樞，實行「反赤」，北京政治環境繼續惡化，國民黨的活動空間受到進一步擠壓。1927 年 4 月，李大釗與一批國民黨左派人士在北京被捕犧牲。與此同時，蔣介石厲行「清黨」，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失去了共產黨人的組織與推動，國民黨在京組織及人員轉入蟄伏狀態，黨務再次沉寂。[9]

考察 1920 年代國民黨在北方地區的黨務拓展，丁惟汾的角色值得深入關注。早在同盟會時代，丁氏就被孫中山委任爲山東地區的負責人。1919 年中華革命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之後，丁被任命爲「山東中國國民黨支部部長」。[10]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建立之初，由丁惟汾與李大釗等人負責。國民黨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長江以南，丁則長期深耕國民黨在北方的基層組織。由於當時北方地區處於北洋軍閥的統治之下，國民黨多以學生組織或社會團體等名義做掩護開展活動，如新中革命青年社（簡稱「新中社」）、三民主義實踐社（簡稱「實踐社」）、三民主義大同盟（也稱中山主義大同盟，簡稱「大同盟」）。[11]這些組織相互之間的利益並不一致，但都受到丁惟汾的提攜。此外，由於地緣關係，

---

8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頁 213-247。

9 王建偉，〈1920 年代國共合作與國民黨組織在北京的早期發展〉，《社會科學研究》，2021年第 3 期，頁 174。

10 秦孝儀主編，《革命人物誌》（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集 21，頁 88-89。

11 陳立夫在回憶錄中提到，類似實踐社、大同盟、新中社等，都是因國民黨人在軍閥勢力範圍下從事黨的工作不得不採用的辦法，因爲不能公開用國民黨的名義，「故各地用各種不同名稱，以資掩護」，但需經中央組織部備案。這種狀況不是華北獨有，長江一帶也有 AB 團、學術研究會等組織。參見陳立夫，《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頁 435。由於這些組織多爲祕密組織，留下的原始材料非常少，相關研究主要依賴一些當事人的回憶，因此經常出現相互牴牾的情形。以「新中社」爲例，在不同人的記述中就存在「新中社」、「興中社」兩種不同說法。

在京津一帶謀生的山東人很多，作爲山東人的丁惟汾還利用鄉土觀念，發展了一批山東籍青年相繼加入國民黨，通過不斷培植親信，丁惟汾逐漸形成了一個頗具聲勢的個人勢力集團，可以影響整個國民黨北方黨務系統。[12]

由於北方黨務進展明顯，丁惟汾也藉助此成績在國民黨中央扶搖直上。1926 年 1 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丁當選爲大會主席團七成員之一。同年 6 月，丁與蔣介石、張靜江、王法勤、陳果夫五人被任命爲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組織委員，7 月開始擔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候補委員、青年部部長。1927 年 5 月，開始擔任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訓育主任，蔣介石則任校長。

丁惟汾一直以「親近青年」而聞名，身邊追隨者眾多，「他從東京起，到回山東，到廣州，又到北京，始終保持著與青年密切接觸的興趣和習慣」。[13]在他進入國民黨中央擔任要職之後，推薦王樂平、路友于等人進入中央組織部，也在青年部內安插一批追隨自己的青年，其中多以「大同盟」派成員爲主。這些因素反過來助推丁惟汾勢力在國民黨內部的進一步擴張。此時，丁惟汾不僅對北方黨務有較強的控制力，也開始向南方一些省市，如湖南、雲南、四川、貴州等地的黨部拓展。正是看中這些，蔣介石開始聯合丁惟汾，藉助其勢力向國民黨黨務系統中滲透。丁也投桃報李，在蔣介石建立南京國民政府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蔣介石於 1927 年 8 月下野之後，丁惟汾繼續追隨，他與原南京國民政府的一批「擁蔣」官員避居上海，聯絡策動屬下的各地國民黨黨員反抗當時的中央特別委員會，在蔣重返國民黨政治中心的過程中出力甚多。1928 年 2 月 2 日至 7 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東山再起，正式復職，出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同時，蔣也依靠丁惟汾與陳果夫等人的支持，挫敗了汪

12 陳立夫曾記錄：「在中央黨部中，很少有北方來的同志；而北方人，尤其是山東人，他們來到南京，都會去看看丁先生」，「我們對丁先生的意見很尊重，一般與北方有關的事情我們都向他請教，他熟悉北方的人物和背景」。陳立夫，《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頁 145-146。

13 楊仲揆，《剛毅木訥的學者革命家——丁惟汾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3），頁 189。

精衛和西山會議派對中央黨務權力的覬覦，控制了中央黨部，並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陳果夫代理）。丁惟汾與陳果夫由此成爲蔣介石向黨務系統拓展權力觸角的左膀右臂，並藉此躍居中央黨務權力核心。

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經蔣介石、陳果夫、丁惟汾三人聯合提案，通過了〈整理各地黨務決議案〉，其中規定各地各級一律暫行停止活動，聽候中央派人改組；各地黨員一律重新登記，登記期間停止徵求黨員；各省及等於省之黨部由中央派黨務指導委員七人至九人組織黨務指導委員會，辦理黨務整理及登記一切事宜；整理期間，黨務指導委員會代行該地執行委員會職權。[14]以此爲標誌，國民黨開始新一輪的黨務整理，各地組織迎來新的人事變動，原有的利益鏈條被打破，不啻爲地方黨務系統的一次重新洗牌。丁惟汾藉此機會在北方進一步擴張勢力，山東、直隸、天津、北京等地黨部的主要位置幾乎全被丁派人馬壟斷。1928 年 3 月 30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 124 次常務會議，通過了中央組織部提名的北京市九位黨務指導委員人選：馬洗繁、王季高、梁子青、徐季吾、黃國楨、許超遠、李洛三、李吉辰、黃如金。[15]

就在中央重組各地黨部的同時，國民革命軍啓動「二次北伐」，一路勢如破竹，1928 年 6 月初已經兵臨北京城下，原本控制京津的奉系軍隊退出。6 月 6 日，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在宣武門外湖南會館召開黨務公開之後的第一次會議。[16]6 月 7 日，北京特別市黨部指導委員會舉行正式成立會，九位黨務指導委員有了更明確的職務，王季高、黃國楨、李吉辰爲祕書處委員，黃如金爲組織部部長，許超遠爲宣傳部部長，徐季吾爲訓練部部長，李洛三、李吉辰、黃如金、徐季吾、許超遠爲民眾訓練委員會委員。[17]北京改稱北平後，市黨部

14 〈整理各地黨務決議案〉，收入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上，頁 521。

1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冊 4，頁 13。

16 〈國民黨北京市黨部昨日公開舉行第一次會議〉，《益世報》（北京），1928 年 6 月 7 日，第 3 版。

17 〈北京市黨部成立紀事〉，《大公報》（天津），1928 年 6 月 9 日，第 3 版。

也相應更名。7 月初，國民黨中宣部祕書谷正鼎由南京來到北平，擔任市黨部指導委員兼常務委員。

北平市黨部的指導委員全部來自國民黨先前祕密活動時期的幾個「小組織」，其中以「大同盟」勢力最大，黃如金、許超遠、李洛三、王季高、李吉辰都屬於這一團體。馬洗繁、梁子青屬於「新中社」，徐季吾、黃國楨屬於「實踐社」。九位指委都很年輕，除馬洗繁為大學教授外，其餘八人均為在校學生黨員，分別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大學、中法大學等。[18]由於分屬不同的團體，利益不一，相互衝突不可避免。上海《先導月刊》觀察指出：「北平市黨部指導委員人選，大半為山東人中央委員某某之高足……非山東人則失勢，暗爭甚烈」，「其中有大學甫卒業者，有尚未在中學卒業者，有從前共產黨員」。[19]地緣關係與派系關係疊加，使得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的北平黨務呈現出鮮明的地方色彩，為日後與中央的對抗埋下了伏筆。

北平市黨部雖然開始公開活動，但限於活動經費、辦公場地等因素，一直未能全面開展工作。九位指導委員也未能全部到齊，馬洗繁因就任河北省政府祕書長，一直未到市黨部報到。黃國楨、徐季吾、梁子青三人也以工作無法進行為由，自動去職。媒體報導，三人「數日前，即移居醫院，市黨部人往訪，均未得見，五日晨宣布辭職，市黨部本身亦未聞知。據李委員吉辰談，辭職事，詳情尚未判明，惟確因個人私事，並非黨部本身分裂。現本黨部委員會已一方電津，一方以委員私人資格勸導，萬勿消極，共同奮鬥云云。」[20]李洛三也因

18　關於這些人的身分考證，參見焦實齋，〈新中學會與新中革命青年社〉，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輯 119，頁 1-6；郝任夫，〈中山主義大同盟的歷史概況〉，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輯 142，頁 103-105；李中舒，〈有關「實踐社」的資料片斷〉、程厚之，〈「實踐社」史略〉、李冠洋，〈中山主義大同盟〉，均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政府．政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頁 205-207、頁 199-202、頁 23-26；張潤三，〈關於大同盟的回憶〉，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河南文史資料》（鄭州：河南省政協文史辦公室，1986），輯 19，頁 1-2。

19　呂立言，〈黨軍到後之北平現象〉，《先導月刊》（上海），卷 1 號 4（1928 年 9 月），通信欄頁 2。

20　〈平市指委梁黃徐等辭職〉，《益世報》（天津），1928 年 8 月 6 日，第 1 張第 4 版。

病請假兩星期，以致「市指委會因環境欠佳，工作無形停頓」。[21]當時最活躍的部門是民眾訓練委員會，「訓練一事，在敝部實爲最要之圖」，故將以三民主義爲立足點，對民眾進行訓練。[22]「其他各部，或以人才關係，或以經濟與環境關係，不能放手作去……最近環境日趨惡劣，市黨部經濟竭蹶，四面楚歌。」[23]可以說，北平市黨部自公開之日起，就未曾呈現一個完整的組織面貌。

北平黨務公開之後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重新開放黨員登記並籌建各區基層分部。國民黨在北京早期發展階段，黨員數量極其有限。1920 年代國共合作之後，國民黨在京組織迎來較大發展。但此時以擴張黨員數量爲主要目標，缺乏嚴格的入黨審核手續，一位黨員後來回憶說：「其時加入國民黨的只是填了表格，附相片兩張，由介紹人送去，過幾天拿回像名片大小的黨證，即算完成入黨手續。」[24]張作霖進駐北京之後，國民黨的處境更加嚴峻，「各黨員恐被搜檢，多將黨證毀滅」，[25]導致國民黨在京黨員底數更加不清。

1928 年 6 月 15 日，北平市黨部要求無論新舊黨員，均須重新進行登記；同時因「黨中共產及反動分子，仍隱匿甚多」，決定對各黨員資格實施審查。[26] 6 月 25 日，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以黨員資格到市黨部報到，並對外表達了六點意見，中心思想即落實在黨務整理方面，具體包括黨員登記、黨義學習、統一主義等。[27]7 月 25 日，市黨部正式開始黨員登記，具體程式是「先筆試，次口試，及格者，再調查其平日操行。無黨證者，須有忠實黨員三人之保證」。[28]據報導，黨部對此次總登記「極爲愼重」，設爲調查時期、登記時期、審查時期三個階段，其中第一階段的調查主要針對「共產分子

---

21 〈北平要訊〉，《申報》，1928 年 8 月 17 日，第 4 版。
22 〈北京特別市黨部宣布厲行清黨〉，《順天時報》，1928 年 6 月 16 日，第 7 版。
23 〈北平黨潮爆發〉，《申報》，1928 年 8 月 23 日，第 3 張第 10 版。
24 芝廠，〈清剛耿介的丁惟汾先生〉，收入朱傳譽主編，《丁惟汾傳記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1979），頁 18-19。
25 〈北京市黨部最近工作〉，《京報》，1928 年 6 月 14 日，第 5 版。
26 〈北京特別市黨部宣布厲行清黨〉，《順天時報》，1928 年 6 月 16 日，第 7 版。
27 〈白崇禧之黨的表示 述六項要點〉，《大公報》（天津），1928 年 6 月 29 日，第 6 版。
28 〈平市黨部辦總登記〉，《申報》，1928 年 7 月 28 日，第 2 張第 7 版。

與國家主義分子」。[29]爲了向民眾宣傳黨員登記之意義，市黨部還在各街市黏貼標語，散發關於登記目的之傳單。[30]

經過初審，共計 2,757 名黨員通過資格認證。但在此時，中央黨部下達命令，提高了登記門檻，「限制綦嚴，如共黨嫌疑反革命，及平日工作無成績者，概不許其登記。」[31]至 8 月底，共登記黨員 1,843 人，最終合格者爲 1,790 名，待偵查者 53 名，此外還有尚須續辦登記者約爲 500 人。[32]11 月底，北平市黨部確定共計 11 個區黨部，其中，內城 8 個，外城 2 個，西山 1 個，由北平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選派合格人員組織，各區黨務指導委員會在整理黨務期間，代行區執行委員會職權。[33]

這次黨員登記引發了一場風波。在北平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中，原本佔據多數勢力的「大同盟」通過把持黨員登記，進一步擴張勢力版圖，因此遭致了「新中社」、「實踐社」等派的不滿。他們指責「大同盟」爲「投機的小組織」，稱其「毀黨造派」與「以派辦黨」。批評者羅列了此次黨員登記中的諸多弊端，包括新黨員多過舊黨員、投機分子多過革命同志、多數忠實革命同志被摒棄等現象，「因爲他們有了『辦黨視同辦派』的錯誤觀念，所以處處看到的，只是他們私的利害相同的親戚朋友，而忘掉了出生入死爲黨犧牲的同志」，由此導致的現象是「大同盟」力量的增長以及國民黨力量的「一落千丈」。[34]「只看到大同盟盟員的活動，而看不到本黨黨員的活動，只看到有大同盟的盟務，而看不到本黨的黨務」，實際上就是用「大同盟」取代了「國民黨」。[35]他們呼籲打倒「大同盟」對北平黨務的操縱，要求通過開展補充登記，清查夾

29 〈北平市黨部注意改革戲劇　積極辦理總登記〉，《益世報》（北京），1928 年 7 月 28 日，第 6 版。

30 〈市黨部新標語　解釋登記之意義〉，《益世報》（北京），1928 年 7 月 24 日，第 3 版。

31 〈北平指委會之工作〉，《益世報》（天津），1928 年 8 月 10 日，第 1 張第 2 版。

32 〈山東北平報告登記概況〉，《中央週報》，期 25（1928 年 11 月），頁 2。

33 〈平市黨部組織區黨指委〉，《北平日報》，1928 年 11 月 27 日，第 3 版。

34 塵，〈改組平北兩黨部中之登記問題〉，《革命新聲》，期 2（1929 年 1 月），頁 6。

35 沉，〈補行登記的重要〉，《革命新聲》，期 6（1929 年 3 月），頁 1。

雜其中的共產分子、投機分子與腐化分子，重新切實整頓北平黨務，進而實現市黨部人員結構的再調整。

中央黨部也注意到了各地黨員登記中出現的一些傾向與問題，開始針對性採取措施，在第 179 次中常會上制定了〈補行登記手續條例〉，議決了新的黨員登記辦法：「黨員登記期延至年底截止，凡同盟會會員、中華革命黨黨員及民十三改組前登記黨員，適用特別登記表。凡有保證者，均可登記。」[36]這一方案實際上放寬了對黨員資格的認定標準，其中一條微妙之處是將認定黨員資格的時間點確立為 1923 年，即國民黨正式改組之前。參照這一標準，當時因反對國民黨改組而被孫中山排除在黨外的一批「老同志」有了重新恢復黨員身分的合理途徑，實際上是為他們回歸國民黨組織開通了渠道，這也是為糾正先前登記中出現的「新黨員多過老黨員」的情況。[37]這一條例還明確提出，特種登記表由中央特種登記審查委員會審定，該委員會由蔣中正、譚延闓、戴傳賢、胡漢民、孫科、李濟琛、陳肇英、何應欽、葉楚傖、繆斌、陳果夫十一人組成，由中央組織部長召集開會。[38]

北平市黨部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他們認為，如果照此方案，「總理改組本黨時認為不革命、假革命之分子而擯除之者，亦得認為忠實同志，而履行登記矣，此與十三年總理改組本黨之精神與意義殊相違背」。[39]不過，補行登記仍然得以執行，據報導，短短三日報名登記者已達二千餘人。市黨部還接到各方報告，「列舉有不少腐化分子，報名登記，並有不少黨員來函否認其保證之補登記黨員」。市指委會組織部為慎重起見，決定嚴格審查，提高認定標準，包括：（一）有黨證者；（二）有登記證者；（三）前北平黨員登記名冊有姓名者；（四）前在外省登記則審查保證員有無保證資格。[40]

36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06），冊 4，頁 268。
37 〈修正補行登記手續條例〉，《中央黨務月刊》，期 6（1929 年 1 月），法制欄頁 7。
38 〈中央通過補行登記手續條例〉，《中央週報》，期 22（1928 年 11 月），頁 1。
39 〈市指委會電京抗議兩事〉，《北平日報》，1928 年 11 月 16 日，第 3 版。
40 〈市黨部補登記正在審查〉，《北平日報》，1928 年 12 月 18 日，第 3 版。

面對這種局面，南京方面進一步提升了整頓力度。1928 年 12 月，中央黨部決定派張繼、李石曾二人爲河北以及北平、天津兩市補行特種登記委員，這是中央政府對北平黨務加強干預與控制的重要信號與步驟。二人作爲國民黨元老，均在北方根基深厚。張繼政治立場偏右，屬西山會議一派，國共合作時期，以該派爲後臺的民治主義同志會就與「大同盟」派衝突不斷。考慮到張繼勢單力薄，中央採取多種方式爲其「壯威」，一方面向張表示「對於所謂反動分子，著即依法懲戒，勿稍顧慮」；另一方面聯絡閻錫山，「轉飭北平各軍警機關，予以充分的保障，遇事秉承張之主張辦理，至必要時，中央派員蒞平查察」。[41]

面對中央的補行登記決定，北平市黨部再次表示強烈抗議：「查張繼爲西山會議派首領，李石曾爲無政府黨著名領袖，叛黨禍國，劣跡昭彰，黨員民眾，尤深痛恨。其餘諸人，不爲官僚則爲西無走卒，若以之辦理本黨登記……恐不爲叛黨之西無分子，即爲貪污土劣，影響所及，本黨基礎，將爲之掩撼而摧毀也。」[42]河北省黨部也反問：「張繼，是西山會議派的渠魁，李石曾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梟獒。他們早已脫離了革命立場，成了本黨的叛逆。不加以嚴重的處分，黨的威信已因墮落；又那可委之做黨！這不是自掘墳墓，自促亡黨嗎？！」[43]丁惟汾也表示不樂觀，在與閻錫山派駐上海的代表張天樞私下談及：「至於溥泉〔按：張繼〕，腦筋麻糊，絕非能主北方者。石曾不過借其撐持局面，自作後台老闆。」[44]由於北方政情過於複雜，在各方掣肘之下，張繼單槍匹馬，赤手空拳，「頗感束手無策之苦」，最終無功而返。[45]

北平黨員登記的風波持續了一段時間，在 1929 年 3 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時任中組部祕書張道藩提出臨時動議，即日停止補行統計與特種登記，以後只准按照修正後之總章，定期開始嚴格徵求新黨員。這一提

41　〈中央予張繼以保障　黨員反動可便宜行事〉，《順天時報》，1929 年 2 月 21 日，第 2 版。
42　〈平市指委抗議張李補行特種登記〉，《北平日報》，1929 年 3 月 1 日，第 7 版。
43　普暄，〈北平河北指委的撤委〉，《河北週刊》，期 21（1928 年 12 月），頁 35。
44　「張天樞電閻錫山說明同丁惟汾談話內容」（1928 年 11 月 24 日），〈北伐後之中央政局案（二）〉，《閻錫山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 116-010101-0054-110。
45　〈張辭有因〉，《益世報》（北京），1929 年 2 月 1 日，第 3 版。

議獲得通過，北平市黨部隨即停止特種登記。[46]不過，由於中央一直沒有配發黨證，北平市已經完成登記的黨員身分並不被正式承認。直到同年 5 月 18 日，北平市黨部才領到第一批共計 350 份。[47]

三、「三全大會」代表人選之爭與中央調撤北平指委

北平黨務公開之後，黨潮頻發，既有因黨員登記引發的內部派系鬥爭，也有因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三全大會」）代表人選問題產生的地方對抗中央的舉動。1928 年 8 月，蔣介石提議立即召開「三全大會」，這是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之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對蔣氏個人而言，意義重大，並爲黨內各派所矚目。當時在國民黨內部既有「擁蔣派」，也有「擁汪派」，胡漢民以及西山會議派也有相當數量的追隨者。各地黨部的政治態度與派系分屬十分複雜，遠未形成統一，尤其是汪精衛以深厚的黨內資歷，加之與改組派的結合，在黨內外擁有很大的影響力。蔣介石意圖通過此次會議，強化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和黨治基礎，進而實現對黨務權力的全面控制。不過，各地黨部大多數都未完成黨員登記，工作未能完全進入正軌，只有黨員資格得以認定之後，才能選舉大會代表，因此會議只能延期。

10 月 25 日，中央黨部召開第 179 次常務會議，專門討論「三全大會」籌備問題，焦點即爲參會代表人選。會議決定各地代表名額「由省市黨部選出半數，另由中央指定半數。凡登記未辦畢及未正式成立黨部者，其代表由中央指定」。[48]如果遵循這種規則，各地黨部的自主性將大大減弱。蔣介石可以通過中央指定方式，輔以地方選舉，打壓其他勢力，從而實現對會議政治方向與重

46 〈停止補行特種登記〉，《北平日報》，1929 年 4 月 11 日，第 7 版。
47 〈北平市黨證頒到 市黨部定日內頒發〉，《華北日報》，1929 年 5 月 19 日，第 7 版。
48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4，頁 268。

要權力資源配置的把控。[49]此方案一出，引發許多地方黨部的抗議活動，即便是中央黨部所在地南京也因代表人選問題爆發了直接衝突。北平市指委通電：「今本黨統一全國，各省及特別市黨部次第成立，各地代表均可按法選出，實無由中央指派之必要」，並稱中央此舉是「置大多數黨員之意志於不顧」，並與民主集權制原則相違背，建議改定辦法，「以重黨紀」。[50]這種現象反映出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初期的權威缺失以及無法完全駕馭地方黨務的窘境，而且這種狀態一直與其在大陸執政相始終。

多地持續抗議收到效果。11 月 16 日，國民黨召開第 183 次中常會，決定「三全大會」延期至 1929 年 3 月 15 日舉行，代表產生的名額和辦法另外再定。[51]這一情況也困擾著蔣介石，他在日記中記載：「各處黨部反抗中央，左右爲難，思慮難安也。」[52]12 月 7 日，國民黨第 186 次中常會決定，凡省或等於省之黨部於 1929 年 2 月 15 日以前正式成立，並經中央審查認爲組織健全者，其代表完全由黨員選舉產生；凡 1929 年 2 月 15 日以前未正式成立者，其代表由該省黨部指導委員會負責指導所屬黨員，依照中央規定之選舉法，選出加倍人數，由中央圈定或由中央指定加派人數，由省代表大會選舉；縣市以下之下級黨部，組織尚未健全者，由中央指定。[53]新的代表產生辦法公布之後，不僅未能平息各地黨部的反對浪潮，反而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河北、北平等地黨部也積極參與其中。

此時在中央黨部方面，情形也發生變化。「二次北伐」之後，胡漢民從海外回國，並爲重返國民黨黨務中樞而努力。胡的這塊招牌正爲蔣介石所需，蔣、

49 據陳公博估計，如果採取這種辦法，中央將控制全部代表的 96%以上，因此，「這個大會實在算不得什麼代表大會，只配說蔣先生個人的御用會議。經過這次大會，國民黨的精神可以算壽終正寢」。參見陳公博，《苦笑錄》（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頁 135。

50 〈省指委會抗議中央黨務辦法 北平市指委會電〉，《益世報》（天津），1928 年 11 月 17 日，第 1 張第 3 版。

51 〈中央黨部通令三全大會延期舉行〉，《河北週刊》，期 17（1928 年 11 月），頁 23。

52 〈蔣中正日記〉，1928 年 11 月 17 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下略）。

53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4，頁 514-515。

胡合作的局面逐漸形成。[54]以胡漢民的資歷，勢必對丁惟汾、陳果夫的政治空間形成擠壓。當時正在南京擔任內政部副部長的趙丕廉向老上級閻錫山通報：「察綏兩區指導之幼稚行爲，當即分別告知各要人。惟中央黨部正在計畫改組之際，丁陳二部長頗消極，且與該指導等關係甚深，擬俟中央改組，胡孫蔡到部任事後再行著手。」[55]蔣介石與胡漢民、孫科等人聯手，對北平的「大同盟」十分不利。

由於北平的實際控制者是閻錫山，馮玉祥、白崇禧等人在此也有一定勢力，國民黨中央對北平的一舉一動需要協調各方關係。因此，蔣一直在暗中觀察，充分醞釀，通過先期與這些地方實力派溝通，取得他們的支持之後再採取行動。中央與地方層面的鬥爭交織在一起，各種因素相互纏結，爲北平的黨務走向增加了諸多變數。

1928 年 12 月 20 日，國民黨召開第 188 次中常會，決定撤調北平市黨部指導委員黃如金、李洛三、李吉辰、徐季吾、梁子青五人，遺缺以閻錫山、商震、梁永泰、蕭子昇、方振武補充。[56]這幾人均屬閻系，《順天時報》將此結果歸之於蔣介石、胡漢民、戴季陶等人的「煞費苦心」，主要目標是取締「丁惟汾系之過激分子」，並將地方軍政實力者網羅其中。該報還指出：「近來各黨部中，多有共產系及左傾分子，每藉愛國或民眾運動之名，常有不穩行動，無論對內對外，恆於國民政府自身不利」；「從來北方各黨部，非但不服從中央黨部命令，而且暗中活躍，密謀推倒現政府，此項證據，最近已爲政府當局所獲得」，「故無論以國民政府當局言，抑以中央黨部言，皆屬於預定之行動

54 蔣永敬，〈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實施訓政的背景及挫折——軍權、黨權、民權的較量〉，《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頁 86-87。

55 「趙丕廉電閻錫山察區所委六人係籌備名義將來中央重委使正式成立」（1928 年 9 月 15 日），〈北伐華北善後案（二）〉，《閻錫山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 116-010101-0051-129。

56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 188 次常務會議記錄〉（1928 年 12 月 20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冊 6，頁 460。此次會議之前，徐季吾、梁子青早已經告假數日。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北平市的這次指委調整，是中央整個大布局、大動作的一部分，在 188 次中央常會上，調整指委的範圍涵蓋浙江、山西、陝西、雲南、綏遠、湖南、河北、北平、江西等地。

也」。[57]《大公報》也有類似分析：「北方各省市指委，均於丁〔惟汾〕主黨時所委。自胡戴入主中央，中央黨部與各地黨部，氣味早不甚相投。第三次代表大會，轉瞬開幕，而中央因指派代表辦法，未獲完全貫澈，勢不能不別作布置，遂有調撤指委之舉。」[58]

中央黨部雖在常務會議上決定調撤北平指委，但沒有立即以官方文件形式正式下達。不過，這一消息還是通過其他渠道散布出去，以致掀起「滂沱洶湧之勢」。北平市黨部 21 日通電，請中央收回成命。市指委還通電主張鞏固黨權，「對戴胡陳有微詞」，並電催請汪精衛、于右任入京，「某政客向某要人建議，若中央命令更換指委時，給他們一個利害」。[59]

在調撤命令正式下達之前，北平市黨部在表面上仍保持鎮靜，堅持照常辦公，赴河北各縣視察黨務的計畫並未更改，對各區分部之組織工作也未中斷，各種紀念周、宣傳周等照常舉行。[60]「市黨部方面，昨日工作仍甚積極，即組織部之例會，亦照常開會。惟登記黨員，因採用特種登記等，事關重要，決展緩舉行測驗。民訓會昨亦開部務會常會，除由主席李洛三致詞，希望本人如奉命撤調，諸同志仍當繼續奮鬥外，各項重要議案仍繼續討論進行。」[61]暗地裡，「黨部指導下之各民眾團體及下級黨部『護黨』之工作，則日益加緊」。[62]

考慮到指委調撤之後，各民眾團體受到的影響最大，北平市總工會、商民協會、農民協會、婦女學會、北平學聯等作爲黨部的代理人走上前臺，紛紛通電反對「以軍人政客治黨」，質問調撤理由，並組織護黨團，發出「護黨」呼聲。[63]北平市各區黨部指導委員聯席會議也發表主張，將矛頭直接指向胡漢民、戴季陶與陳果夫，稱其「把持操縱全國黨務，排擠忠實不阿附不爲其私人

57　〈河北省市黨部改組之索隱〉，《順天時報》，1928 年 12 月 22 日，第 2 版。
58　〈北平觀潮雜記〉，《大公報》（天津），1928 年 12 月 25 日，第 2 版。
59　〈平津近聞〉，《申報》，1928 年 12 月 23 日，第 2 張第 7 版。
60　〈北平護黨潮高萬丈〉，《大公報》（天津），1928 年 12 月 25 日，第 2 版。
61　〈北平河北兩黨部更換大批指導委員〉，《北平日報》，1928 年 12 月 22 日，第 1 版。
62　〈撤調指委只聞其聲〉，《大公報》（天津），1928 年 12 月 26 日，第 3 版。
63　〈平市各工會組織護黨團〉，《北平日報》，1928 年 12 月 24 日，第 2 版。

工具之革命同志計，而出此卑汙惡劣的陰謀」，「望本黨忠實革命同志，一致奮起，聲討此篡竊黨權之蟊賊，以肅黨紀，而固黨基」。[64]

北平市總工會、學聯等五團體還成立了「北平特別市民眾五團體聯合辦事處」，並議定於 12 月 28 日在天安門召開「北平民眾護黨第一次大會」，計畫整隊遊行示威，並在北平一些報刊中刊載廣告：「軍警當局，無權禁止。本處抱大無畏之精神，不顧一切犧牲」[65]。在其發布的宣言中聲稱，國民黨已被腐敗分子把持，「忠實同志走開，而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卻一個個跑進黨裡來，使革命的國民黨，漸漸腐化了革命，不能滿足了民眾的要求。換句話說，整個的黨離開了革命的立場，失掉了革命的精神」，因此，革命群眾要拿起武器護黨，打倒腐化分子，捍衛黨的榮譽，使革命的國民黨恢復他的立場，完成他的使命。[66]不過，護黨大會最終未能按計畫舉行。《北平日報》刊出的緊急啓示對此解釋是受天氣影響，「大雪紛飛，道路泥濘」，實際情況則是在閻錫山的指使下北平軍警提前進行了干預。[67]

國民黨中央一直未對外正式公布北平市指委的調撤命令，引發媒體猜測與議論，「自事實言之，中央既欲更動辦事人員，自應先有接洽，預為布置，舊者如何使其便利交代，新者如何使其易於接收。在提出決議之前，當有通盤規畫，分別準備，俾可令出惟行，不生窒礙。今乃決議經旬，而消息寂然，謂其眞耶，應有正式公布；謂其僞耶，應有更正聲明，乃二者皆無所聞。」[68]另外，對於新任指委人選也引發質疑，「請看中央新委的幾位指委，不是軍人，就是腐惡分子。我們固然不承認武裝同志沒有辦黨資格，但是我們總以為辦黨是最煩難的工作，非專一負責，不能有好的成績。我們知道，新委的幾位武裝同志，

64 〈北平市調撤指委潮〉，《國聞週報》，卷 6 期 1（1928 年 12 月），頁 2。
65 〈北方護黨問題宜速解決〉，《大公報》（天津），1928 年 12 月 30 日，第 1 版。
66 〈撤調指委只聞其聲〉，《大公報》（天津），1928 年 12 月 26 日，第 3 版。
67 〈北平特別市民眾五團體聯合辦事處緊急啓事〉，《北平日報》，1928 年 12 月 29 日，第 2 版。
68 〈北方護黨問題宜速解決〉，《大公報》（天津），1928 年 12 月 30 日，第 1 版。

都是『長呵』『令呵』，兼了不知多少，他們能不能還有時間來做黨？就是勉強來做，能不能做到好處？」[69]

1928 年 12 月 31 日，國民黨中央祕書處致函北平特別市指委，傳達了中央第 188 次常會關於調撤北平指委的決議。[70]《北平日報》甚至報導，新任指委將於 1929 年 1 月 7 日正式到黨部宣誓就職。[71]不過，閻錫山婉拒了中央的任命：「黨務重要，本當努力，惟自揣多病，恐不克勝此鉅任，辱荷雅教，謹致謝忱。」警備司令張蔭梧也以「事忙」爲由，表示無暇兼任指委。[72]實際上，對於這一任命，閻錫山似乎之前也並不知情，在發給北平警備司令張蔭梧的電文中表示：「北平市河北省黨部改組，事前毫無所聞。據聞係北平電保數十人，經果夫與鼎臣〔按：丁惟汾〕協商結果，從數十人中選若干，另加若干。」[73]另一新指委人選、時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則在回答記者時表示：「予對於北平市黨部，早具有整頓之決心，本想就職後努力整頓，但就職後無整頓能力，不若不就之爲愈。至閻總司令對於市指委一席，曾有電致市黨部，內有老朽不勝繁劇等語，極力遜謝。予爲就職事，數日前有電陳閻總司令，請示一切，閻復電謂，如中央催令就職時，儘可就職。予日內斟酌情形，設無多大妨礙，當可決定。」[74]

閻錫山與商震的這番曖昧表態產生了連鎖反應，其他幾位新任指委也遲遲不肯就職，而那些被撤的舊指委聽聞消息之後，知道自己的職位不能久延，未待新指委到任就停止了工作，以致北平市黨部「青黃不接」，「無形停頓」。[75]此時，北平黨務工作一片混亂，《北平日報》報導：「自三號接到中央調撤命

69 普暄，〈北平河北指委的撤委〉，《河北週刊》，期 21，頁 35。
70 〈北平黨務已無問題 新指委定下星期一就職〉，《大公報》（天津），1929 年 1 月 5 日，第 2 版。
71 〈北平市黨部新舊指委即將交替〉，《北平日報》，1929 年 1 月 5 日，第 2 版。
72 〈閻覆平市黨部電〉，《申報》，1929 年 1 月 9 日，第 2 張第 8 版。
73 「閻錫山電復張蔭梧省黨部改組事前毫無所聞據聞北平電保數十人」（1928 年 12 月 23 日），〈北伐華北善後案（二）〉，《閻錫山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 116-010101-0051-285。
74 〈商震對北平新聞界談話〉，《申報》，1929 年 1 月 15 日，第 3 張第 10 版。
75 蘇章，〈平市黨務指委問題〉，《政治月刊》，卷 1 期 3（1929 年 3 月），頁 3-4。

令後，四號即通知各新指委，惟迄尚未接新指委就職通知，外傳星期五就職，及新指委工作如何分配各節，指委會方面，尙未聞悉。至留任各舊指委與新委間有無若何磋商與意見之交換，指委會方面，亦不甚明瞭。調撤各指委，自命令到後，即不到部工作。現是否赴京或仍在平，亦難知悉……黨部指導下之各民眾團體，最近工作，精神頗見疏淡，或因新舊黨指委交替時一切工作，無人指導之故云。」[76]北平黨務工作的混亂已經波及社會秩序層面。北平警備司令張蔭梧電告閻錫山，稱北平黨務「已陷於無政府狀態」，並已影響城市治安。[77]閻錫山也通電囑咐商震：「查現黨部新執委未到，前舊委所辦各事似近共產行爲，萬望注意此點。」[78]

在此情況下，北平市黨部電催新指委入職：「新指委迄今尚未就職，一切黨務，諸難進行，請令催迅速任職，以維黨務。」[79]1929 年 1 月底，谷正鼎請假兩星期，離平赴南京，據分析是「面請中央敦促新指委速來就職，並報告北平黨務最近情形，商領黨證」。[80]但據媒體報導，谷本人確實去了南京，但「並未向中央有所接洽，此行純爲料理私事」。[81]不過，這番催促並未奏效，平津及河北黨務視察員鄭異在與北平各新舊指委交換意見後，對外表示「無甚辦法」，「據彼觀察，新指委且難有就職希望，另派指委則與北平黨務情形，恐難熟悉，且三代大會〔按：即三全大會〕開幕在即，中央自亦不願多事更張。且照中央頒決條例在二月十五日以前正式黨部成立，得選出委員請中央圈定，現距限期只二、三天，即新指委來就職，亦難遽就，是以北平黨務目前實無辦法可言，惟有靜待三代大會解決而已。」[82]

---

76 〈新市指委就職期未定〉，《北平日報》，1929 年 1 月 9 日，第 2 版。

77 「張蔭梧電閻錫山說明北平黨務糾紛影響治安之情形」（1929 年 2 月 28 日），〈北伐附晉冀察綏黨政案（一）〉，《閻錫山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 116-010101-0058-137。

78 「閻錫山關於印布告派憲警制止北平風潮及黨部舊委辦事似近共黨行爲等事給商震的函」（1929 年 2 月 15 日），見趙麗潔，〈走進商震首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歲月——商震往來信函檔案大觀〉，《檔案天地》，2007 年第 3 期，頁 35。

79 〈北平市指委請中央催新委就職〉，《益世報》（天津），1929 年 1 月 22 日，第 1 張第 2 版。

80 〈谷正鼎赴寧〉，《新中華報》，1929 年 1 月 29 日，第 2 版。

81 〈中央派向道來平．視察河北及北平黨務〉，《新中華報》，1929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

82 〈北平黨務現無辦法〉，《新晨報》，1929 年 2 月 14 日，第 3 版。

北平的這種局面可能正爲南京中央所樂見，因爲依據之前頒布的相關選舉辦法，須在 2 月 15 日之前選出「三全大會」代表。而北平黨務因無人負責，遂致代表無法如期產生。最終代表北平參會的是馮玉祥、閻錫山、白崇禧、方振武、羅家倫、孔祥熙、王正廷和鹿鐘麟八人，北平市黨部原指導委員無一人入選。爲此，市黨部通電全國，認爲中央此舉「不特違反本黨全體黨員之意志，尤負本黨民主集權制之精神」，「環顧黨國險狀，不但非本黨成功之時，抑且爲本黨艱難困苦之時」。[83]

國民黨「三全大會」結束之後，北平新任指委仍未上任，據報導，「數月來，僅谷正鼎一人照常到部工作」。[84]其他指委黃如金、李吉辰自奉令撤職後，「即整裝回籍，聞最近中央爲培養革命人才起見，擬資送黨部工作人員，赴國外大學讀書，以資深造」。[85]而被任命的新指委、原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政訓部主任梁永泰也因遲遲未能上任而怠惰消極，公開表示：「北平黨務，更可謂無法收拾，以余觀察，在過渡期中，難免有甚大之紛擾。結果若何，亦未敢言。至余等就新指委一事，現在已成過去矣。」[86]

北平市指委位置長期空缺，產生諸多負面影響，「北平黨務自去歲公開以來，即發生種種的糾紛。最近因舊指委太半被撤換，更形成無人負責的現象，一任各部祕書及幹事，假指委會之名義發號施令，乃致中國國民黨的威信，在北平幾喪失殆盡。」[87]《新晨報》也發出質疑：「北方黨務，本有調查改良之說，北平市指委，派定已久，何以至今不見就職，以至時時發生與中央意見衝突之事件，黨之威信安在。」[88]北平行營主任何成濬也向蔣介石通報，稱谷正

83　〈三全大會之反對聲〉，《北平日報》，1929 年 3 月 10 日，第 7 版。
84　〈市指委谷正鼎辭職〉,《華北日報》，1929 年 4 月 20 日，第 7 版。
85　〈黃如金、李吉辰將由中央資送留學〉，《益世報》（北京），1929 年 3 月 9 日，第 3 版。
86　〈梁永泰談黨務〉，《益世報》（北京），1929 年 4 月 5 日，第 2 版。
87　飛，〈平市新指委就職〉，《革命新聲》，期 13（1929 年 6 月），頁 1。
88　雲，〈總商會抗拒反日會〉，《新晨報》，1929 年 5 月 6 日，第 2 版。

鼎接近共產黨，「與某方關係頗深」。他建議蔣立即改組北平市黨部，「擇忠實可靠同志擔任」。[89]

直到 1929 年 5 月 9 日，中央黨部再次決議，原北平黨務指導委員一律撤換，另派商震、羅家倫、李漢鳴、周學昌、張明經、尙武、薛廣漢爲新指委。[90] 其中，李漢鳴、周學昌、張明經皆受到陳果夫的提拔，羅家倫受到蔣介石的信任，此時正任職於清華大學，商震、尙武則屬閻系。這一新的組織架構是陳果夫勢力與閻錫山勢力的集合體，「大同盟」成員則被清除。5 月 31 日，「新指委會正式工作，即行開始」。[91]中央黨部雖然加強了對北平市黨部的掌控，但市黨部並未走向完全統一，「小組織」現象仍未能消除，派系問題成爲國民黨始終不能克服的頑疾。北平市黨部內部的爭鬥仍然繼續，不過是以此派取代了彼派。

四、丁惟汾的隱退與北平黨務的重新洗牌

在既往的一些研究中，多認爲北平黨務公開之初由「大同盟」攪動的地方對抗中央的「黨潮」，丁惟汾居於幕後，暗中「助推」。[92]這一問題需要從兩方面說明。當時市黨部的多數指委確實曾受到過丁的提攜，但是丁本人並未明顯展示出策動地方黨部對抗中央的意圖。他長期在北方活動，並非國民黨中央的核心人物。國民革命時期，丁憑藉北方黨務的快速進展，躍居黨內高層，但影響主要局限於黨務系統。丁畢竟不屬蔣之嫡系，他雖擁蔣，但無法取得蔣的絕對信任，二人關係比較微妙，蔣對丁禮遇有加，但無法完全放權。對於丁派的不斷擴張，蔣已有所警覺。在二屆四中全會上，蔣介石撤銷青年部，調丁惟

89 「何成濬電蔣中正據商震所請即下令改組北平市黨部及可否取締反日會越軌舉動」（1929 年 4 月 20 日），〈一般資料－民國十八年（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80200-00044-013。

90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常務會議記錄〉（1929 年 5 月 9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冊 8，頁 132。

91 〈平新指委昨日接收指委會〉，《華北日報》，1929 年 6 月 1 日，第 7 版。

92 李文平，〈論「丁家黨」在南京政府建立時期的作用〉，《史學月刊》，2008 年第 4 期，頁 74。

汾任訓練部部長，對丁已有所收束。此後，丁惟汾不能再過問青年幹部的組織人事事宜，相關權力轉入陳果夫實際控制的中央組織部。

對於陳立夫、陳果夫兄弟，同為浙江人的蔣更加倚重與信任，雙方的歷史淵源也更深。因此，丁惟汾雖紅極一時，在國民黨內部畢竟羽翼欠豐，同汪精衛、胡漢民以及其他一些「老同志」相比，既缺乏擁有一定軍事實力的地盤做後盾，更缺乏足夠的政治資歷做底蘊。「二次北伐」勝利之後，丁惟汾勢力主要分布的平、津等地被閻錫山、馮玉祥等瓜分，丁實際上是處於各地方實力派的「縫隙」之中，更需要仰仗其他力量的支援。同時，丁派以青年黨員為主，政治經驗與實力都非常有限，他本人對此也有清醒認識，因此並未表現出超出自身實力的政治野心。

從丁惟汾與陳果夫關係角度考量，兩人一度密切合作，是輔佐蔣介石的得力幹將。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之後，蔣介石忙於「二次北伐」的軍務，黨務主要交由兩人負責，二人都藉機跑馬圈地，擴張各自勢力版圖，很多地方黨部的重要位置由他們的屬下瓜分。丁惟汾的根基原本主要在北方，此時南方一些省市黨部也逐漸出現丁派人員身影。在這一過程中，雙方陣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摩擦，當時社會上也流傳一些關於二者矛盾的說法。不過。陳立夫後來對此否認，並對丁惟汾給予正面評價。[93]但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的黨務系統，確實出現了從「丁家黨」到「陳家黨」的權力輪替。

從個人性格上講，丁惟汾為人沉穩低調、木訥寡言，不像胡漢民、汪精衛般強勢，並對於政治的波詭雲譎早有體認。同時，丁本人也一直沒有放棄對純粹學問的興趣。因此，早在「二次北伐」告成之際，丁就以「不能勝任」為由，提出辭呈：「北京克復，瞬將統一，中樞要職，實難勝任，請辭去中央常務委員及訓練部長職務。」[94]蔣介石明確拒絕，並安撫丁：「於報端讀先生辭電，

93　陳立夫，《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頁 145-146。

94　「丁惟汾請辭中常委兼訓練部長案」（1928 年 6 月 18 日），〈第二屆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黨史館藏，檔號會 2.3/87.11，收入《丁惟汾先生史料彙編》，頁 2644。

甚爲惶駭。北伐垂成，萬端待理，黨務最關重要，正賴主持擘畫，務請打銷辭意……無論何種難題，皆可共同商確〔榷〕，努力排難也。」[95]

丁惟汾當時正在上海休養，蔣介石利用到上海的機會，當面對丁做工作，以示「懇切」。據報導，1928 年 6 月 21 日蔣氏到滬後，「當即派人邀丁氏至宋宅力加慰留，再三敦勸」。[96]丁於是與蔣介石一起返回南京。7 月 31 日，丁患痢疾休養，蔣親往丁宅訪問。[97]在各方慰留下，丁暫時打消辭意。在不久之後召開的二屆五中全會上，他對於辭職心跡再次詳細陳述：「現在北京克復了，覺得自己下來的時候已到，故而辭職。我自己看自己，應當審量自己，自己有了許多問題，實在負不了這個責任，就得下來，否則勉強負責，硬做下去，自己倒了不要緊，連累到黨，這個罪過實在負不了。」丁還表示，雖經各方挽留，暫時收回辭呈，但也只是爲了「服從黨的命令」，並以忠實黨員的身分在「總理遺像」前表態，「所說的並無一句或一字是虛假的」。[98]

丁惟汾雖然辭意堅決，但當他注意到北平黨務紛爭不斷時沒有坐視不理，開始聯絡閻錫山，期待後者能出面介入。1928 年 9 月，丁通過閻氏派駐南京的代表劉棫向其傳話：「所謂訓政，即以黨義而訓；所謂建設，即本方略建設。現在黨無辦法，一切軍政，均無頭緒，請伯川極力提倡黨務，公私均便也。」[99]閻客氣回覆：「提倡黨務，爲訓政時代第一要義，自當竭力進行……希轉致鼎丞兄，對北方黨員，請再加以囑託。鼎丞兄能撥冗北來一晤，尤所企盼也。」[100]

丁惟汾最終並未北上，但始終對閻錫山有所寄望，並托張天樞轉告：「北方黨務，仍當請閻總司令多用優秀青年，培養其人格，灌之以智識，專使其從

95 〈蔣介石電丁惟汾．懇速回京主持黨務〉，《時事新報》，1928 年 6 月 18 日，第 3 版。
96 〈蔣總司令昨晨到滬當夜返京〉，《時事新報》，1928 年 6 月 23 日，第 4 版。
97 〈五中全會預備會〉，《民國日報》，1928 年 8 月 1 日，第 2 張第 1 版。
98 〈丁惟汾報告——四次全體會議的歷史和成績及第五次會議的意義〉，收入《丁惟汾先生史料彙編》，頁 2903-2904。
99 「劉棫電閻錫山丁惟汾云現一切軍政均無頭緒請公極力提倡黨務」（1928 年 9 月 4 日），〈北伐華北善後案（二）〉，《閻錫山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 116-010101-0051-126。
100 「閻錫山電復劉棫請轉丁惟汾對北方黨員請再加囑託並盼北來一晤」（1928 年 9 月 9 日），〈北伐華北善後案（二）〉，《閻錫山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 116-010101-0051-125。

事下層工作，較爲易成。」[101]1928 年底，北平市黨部因反對中央調撤指委而陷入亂局之際，丁惟汾專門致信各指導委員進行「囑託」：

> 值此國家振〔震〕撼之秋，作此不穩舉動，諸同志對黨對國負有重任，自身失敗不足惜，其如黨國前途何？……望諸同志幡然改轍，各回本省，一遵中央命令行動。如蒙採納，黨國之福。弟已老憊，不願再問黨事。因事機危迫，不能不盡最後忠告。[102]

不過，丁氏的這份「最後忠告」未能發揮期待中的作用，隨著丁惟汾逐漸淡出，掌控力與影響力明顯弱化，北平市黨部並未因此停止對抗中央的舉動。此時，胡漢民已經成爲國民黨中常會常委，地位舉足輕重，蔣、胡合作的框架體制已經建立。因此，當中央作出調撤北平指委的決定後，已經失去丁惟汾這個「靠山」的「大同盟」幾乎毫無還手之力，迅速瓦解，成員紛紛轉換門庭，既有歸附陳果夫，也有加入改組派，還有成員投奔閻錫山。

概而言之，丁惟汾勢力的崛起，爲國民黨黨務系統注入了一股新銳力量。他對蔣介石的支持，改變了國民黨中派系力量的對比，削弱了反蔣勢力，爲陳果夫的崛起和「蔣家天下陳家黨」的權力分配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最初基礎。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丁惟汾在主觀上雖然沒有表現出對抗中央的明顯意圖，但確實牽涉捲入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中，以他爲中心的集團勢力是客觀存在的，並始終是一股不穩定因素，加劇了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黨務系統的內部動盪。

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北平的黨務紛爭，原因之一即在於「小組織」眾多。[103]不過，這些派系力量分散，基礎薄弱，中央一經出手，即迅速擊破，蔣介石眞正擔憂的是改組派。可以說，「大同盟」等瓦解之後，北平黨務紛爭不斷的主要推手就是改組派。在蔣的認知中，改組派對國民黨的破壞程度甚至要

101 「張天樞電閻錫山說明同丁惟汾談話內容」（1928 年 11 月 24 日），〈北伐後之中央政局案（二）〉，《閻錫山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 116-010101-0054-110。

102 〈丁惟汾致北京市黨部同志電報稿〉，收入《丁惟汾先生史料彙編》，「家藏文件」，頁 0235。

103 陳湘女，〈改組派過去在北平〉，《社會新聞》，卷 2 期 13（1933 年 2 月），頁 167-168。

高於共產黨，他對改組派的印象也更惡劣，多次在不同場合用嚴厲語詞對其進行攻擊。

國民黨「清黨」之後，基層組織受到很大破壞，中央權力結構又一變再變，執行與宣傳多年的「聯俄」、「聯共」口號被迅速拋棄，意識形態方面出現混亂。很多青年既無主義可信，又無出路可尋；既對國民黨的使命與前途產生懷疑，也不認同共產黨的思想與主張，精神上感到苦悶。此時，汪精衛、陳公博等人倡議恢復 1924 年國民黨改組之時蓬勃向上的風氣與態度，恢復國民黨「一大」確立的各項方針，迎合了一大批基層黨員的口味，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通常把這一派別稱之爲「改組派」。1928 年冬，以陳公博、顧孟餘、王法勤、王樂平等人爲首的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委、監委委員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總部，正式建立獨立於國民黨組織系統之外的中央與地方組織，相當於在國民黨之外另立一黨。[104]可以說，國民革命落幕之際，黨內派系鬥爭、中央與地方實力派的博奕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爭論，爲改組派的興起提供了重要基礎。

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後中央整理黨務過程中，改組派人馬也乘機進入一些地方黨部，混雜在江蘇、浙江、湖北、雲南、河南、上海、南京、北平等各省市的整理委員會中。[105]「二次北伐」告成之際，一些地方黨部暗流湧動。改組派藉機利用地方對中央的不滿情緒，加以鼓動。國民黨中央因「三全大會」人選問題引發各地抗議風潮，改組派最初沉默靜觀，後又暗中「運動」，推波助瀾。他們的活動也得到多地黨部的呼應，河南、河北、奉天、漢口、四川、吉林、哈爾濱、北平、天津、山東等地指委紛紛通電反對「三全大會」。不僅如此，在國民黨統治的核心區浙江、上海，黨部內部也有一部分「左派」群體

104 陳公博，〈今後的國民黨〉，收入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頁 568-570。

105 相關研究參見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臺北：國史館，2001），頁 155-183。改組派成員范予遂描述，二屆四中全會後中央派到各地的黨務整理委員中，眞正忠於蔣介石的較少，有很大一部分接近於改組派。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組派〉，收入查建瑜編（下略），《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 130。

發出反對宣言。可以說，這一波反對浪潮的興起，改組派「功不可沒」。[106]在「三全大會」即將召開之際，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等十三人聯合發表〈關於最近黨務政治宣言〉，不僅反對選舉辦法，更直接指斥大會爲「非法」，稱其將國民黨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躪殆盡」。[107]

北平市黨部與改組派的關係糾纏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雙方雖有利益衝突，但在反抗中央問題上立場一致。市黨部成員絕大多數爲青年學生，對國民黨掌權之後組織渙散、精神低落的狀況很不滿意，希冀能夠重新振作，如〈北平特別市第十一區黨務指導委員會成立告同志書〉提出，正是由於 1924 年的改組，「黨的組織由散漫而趨嚴密，黨的訓練由疏懈而趨嚴格」。在他們看來，「封建勢力腐惡分子篡竊於內，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與帝國主義者及其他反動勢力仍然環攻於外，危機四伏，在在堪虞！」因此，必須儘快恢復 1924 年的改組精神。[108]他們這種心理狀態，以及黨務公開之後自身面臨的不利處境，也使其更容易認同改組派標舉的政治主張，從而爲後者在北平的快速發展孕育思想基礎與組織基礎。但一方面，市黨部的一些年輕人雖然在政治理念上傾向改組派，但並不意味著會正式加入；另一方面，確實也有部分黨部成員眞正加入改組派，如原在北平市黨部任職的谷正鼎、蕭訓、段喆人等人，後來都在改組派北平市支部中擔任負責人，北平也成爲改組派在北方的重要基地。[109]

從 1928 年底與 1929 年 5 月，蔣介石兩次改組北平市黨部，清除「大同盟」與改組派，代之以陳果夫 CC 系，吸收屬於閻錫山系的商震、尙武等地方行政大員加入。同時在「三全大會」上將汪精衛、陳公博等改組派領袖開除黨籍，改組派各地方組織也遭受重大打擊。此時，蔣介石與閻錫山的利益尙能維持大

106 陳公博回憶：「我們平心靜氣的觀察整個黨的前途，遂決意反對這個非法的三全大會」，「〔三全大會上〕開除我的黨籍是應該的，差不多反對南京的巨浪，都由我一個人煽起飀風」。陳公博，《苦笑錄》，頁 136-137。另一位改組派成員何漢文也稱：「改組派利用這種機會，作了這次運動（反對三全大會）的主力軍。」何漢文，〈改組派回憶錄〉，收入《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頁 183。

107 〈關於最近黨務政治宣言〉（1929 年 3 月 11 日），收入《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頁 154-157。

108 〈北平特別市第十一區黨部成立經過〉，《國立清華大學校刊》，1928 年 12 月 24 日，第 3 版。

109 何漢文，〈改組派回憶錄〉，收入《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頁 183。

體一致，蔣對北平的黨務整理需要藉助閻的力量，閻至少在表面上表示支持與配合，這一點在 1929 年 6 月北平舉行的新任指委就職儀式上有明顯體現，兩派都將聲討矛頭指向改組派。商震就明確表態：「在黨工作是義務不是權利，是犧牲不是利益，是爲黨不是爲個人」，「以後決不敢加入小組織」。[110]

1929 年 6 月 25 日傍晚，蔣介石抵達北平視察，他在沿途對北方黨務的觀感非常糟糕，「見黨部完全爲反動派所操縱，不勝憂惶」。[111]此處的「反動派」既包括共產黨人，也涉及西山會議派與改組派。在蔣看來，共產黨人與西山會議派的威脅主要發生在「二次北伐」勝利之前，當時最棘手的就是改組派，北方黨務之所以紛爭不斷，主要原因就是改組派從中作梗。27 日上午，蔣介石到北平市黨部講話，主要內容就是「痛斥一般黨員之動搖與改組派之投機」。[112]他提及：「北平爲腐惡勢力之策源，餘毒甚深，同志每易被反動派利用，致黑白不分，民眾心理動搖，是以黨部之整理甚不易，因此中央對北平黨部特別注意。」蔣感歎，「北平方面黨務較任何地方爲複雜，處置最爲麻煩」，嚴厲指責了改組派對國民黨的分裂行爲：

> 應知黨員應有黨員之人格，賣空買空為共產黨之伎倆。從前我們所以主張清黨，即以其專戴著國民黨的招牌，站在後面搗亂，投機取巧。凡投機取巧者，皆不配稱為黨員。現在改組派之手段，即完全與共黨一樣。所謂改組派，其組織與內容，未嘗研究。然其離開中央，另成一部分勢力，以期投機取巧，實與從前之西山會議派無異。其搖動一部分青年同志之心理，使莫知適從，阻礙黨的工作，尤為可恨。[113]

蔣還在當日寫給馮玉祥的私信中稱：「今日之改組派，其卑劣甚於共黨，而其投機叛黨害國賣友之罪，實與十年前之政學會研究系無所區別。苟一爲此輩所牽連，未有不混入歧途而終爲所陷害。」[114]在平期間，蔣介石幾乎每次公開講

110 〈本市指委宣誓就職〉，《華北日報》，1929 年 6 月 9 日，第 7 版。
111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06），冊 6，頁 72。
112 〈蔣中正日記〉，1929 年 6 月 27 日。
113 〈中國確入和平統一時期〉，《大公報》（天津），1929 年 6 月 28 日，第 3 版。
114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6，頁 74。

話，都不忘斥責改組派，用詞也極具攻擊性，如「改組派者，完全是一班叛黨背國的狐群狗黨」。[115]「西山會議派共產黨，均一一被黨的力量消滅，何況此一區區共產黨所不要的東西改組派」。[116]他要求：「凡同志有小組關係者，立即脫離而回到中央領導之下。」[117]

蔣對改組派並未停留在言語抨擊層面，而是迅速採取行動，到達北平次日即致電陳果夫：「平津黨部完全為改組派……未知當日為何有如此圈選，誠是可歎！務希即日改組，其人選應以政府方面五人，另選老成之青年四人。如稍延緩，必誤北方黨務，最好請兄帶數人北來，面商一切更好。」[118]6 月 28 日又致電陳立夫：「此次北上，親見北方黨務複雜已極，改組派及各種反動勢力到處活動，破壞中央，或勾結土劣，或誘脅青年，甚至軍閥時代之舊官僚政客，亦操縱搗亂於幕後，謀危本黨，毫無忌憚。」蔣要求進一步「嚴整紀綱」，「以戢奸邪」，通緝顧孟餘、陳公博、朱霽青、郭春濤等改組派，以「統一黨內之意志」。[119]

陳果夫立即於 7 月 1 日趕到北平，「即行視察省市黨務，深覺北方黨務之缺點，即在於不能各捐私見，共趨公允，遂致黨部方面及津浦、北寧鐵路各工會，內部均極複雜，而宣傳工作尤太不統一，亟宜從事糾正，免淆視聽。」[120] 7 月 5 日，陳氏在北平市黨部對全體工作人員演講，大力斥責西山會議派、改組派分裂國民黨的活動，並對北平黨務的散漫、遲滯提出嚴厲批評，表示要肅清「小組織」的惡劣影響。[121]9 月 2 日，陳果夫在中央黨部再次報告北方黨務整理情形，表示中央「亟應設法糾正」。[122]

---

115 〈中國確入和平統一時期〉，《大公報》（天津），1929 年 6 月 28 日，第 3 版。
116 〈國府成立四週感想〉，《大公報》（天津），1929 年 7 月 2 日，第 3 版。
117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6，頁 146。
118 「蔣中正電陳果夫平津為改組派黨部希即改組請帶數人北來更佳」（1929 年 6 月 26 日），〈籌筆－統一時期（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10200-00006-069。
119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6，頁 95-96。
120 〈陳果夫氏北上整理黨務〉，《中央週報》，期 57（1929 年 7 月），頁 1。
121 〈陳果夫對北方黨務之意見〉，《益世報》（天津），1929 年 7 月 6 日，第 1 張第 2 版。
122 〈北方黨務情形〉，《國聞週報》，卷 6 期 35（1928 年 9 月），頁 9。

蔣介石主要依靠閻錫山來對付北平的改組派，並由北平行營主任何成濬居間聯絡。由何成濬先將改組派的活動情形以及人員名單向蔣介石與閻錫山彙報，然後由閻「轉飭北平各軍警機關」。[123]在何的多次催促下，閻錫山推動北平地方當局對改組派採取更加嚴密的措施。據報導，北平市政府及警備司令部接到閻錫山電令，對改組派嚴加防範，並派密探前往東城京師職業學校逮捕前河北省指導委員劉瑤章未果，前通縣女師範校長段喆人則被捕入公安局看管，同時被捕者尚有三、四起之多。[124]谷正鼎也因「改組派嫌疑」被北平公安局逮捕。[125]

不過，閻錫山處置改組派的態度比較敷衍，投入的力量並不充分，很多時候只是爲了應付蔣介石。因此，改組派在北平的活動一直持續。1930 年中原大戰爆發，蔣、閻成爲戰場上的對手，閻關閉北平市黨部，北平成爲北方反蔣勢力的大本營。中原大戰結束之後，閻失敗退出，爲北平黨務掃除了一大障礙。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介石與汪精衛重新確立了合作關係，同時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鎮壓改組派的組織與活動，全面清查北平市黨部內部的改組派分子。在巨大的壓力之下，改組派分崩離析，其中成員部分追隨閻錫山，部分投靠陳果夫 CC 系，逐漸在北平退出歷史舞臺。[126]

123 「何成濬電蔣中正北平市改組派及反動派活躍分子迭請閻錫山速令緝捕而天津實爲各項反動派謀亂之淵藪亦宜同時取締應否由鈞座另電傳作義從嚴密緝」（1929 年 8 月 25 日），〈領袖指示補編（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90106-00007-278。

124 〈北平捕改組派　市府警備部奉令辦理〉，《大公報》（天津），1929 年 9 月 1 日，第 3 版。

125 〈谷正鼎昨在平被捕〉，《益世報》（天津），1929 年 8 月 30 日，第 1 張第 3 版。

126 張順良，〈論國民黨中央如何清除各地方黨部的改組派份子（1929-1931）〉，《輔仁歷史學報》，期 21（2008 年 7 月），頁 130。

五、結　語

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之初，北平的政治架構非常複雜，中央實施名義統治，實際控制權掌握在閻錫山手中。此外，還存在北平政治分會、京津衛戍司令部等。政治上，夾雜著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的三角關係；黨務上，牽涉到蔣介石與丁惟汾、改組派的關係；軍事上，桂系白崇禧也一度在此駐紮。多種矛盾纏結交織，北平的黨務運行如同處在一個線索紛繁的蜘蛛網中，處處受到制約。

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在北京的黨務快速擴張，但組織呈現出比較鮮明的地方性色彩，主要受丁惟汾個人把持。國民黨在北京成爲執政黨後，這種格局延續了下來，市黨部並不完全受中央領導與掌控，雙方圍繞地方黨權展開持續拉鋸，衝突不斷。面對此種亂局，蔣介石採取動作，聯合胡漢民、閻錫山等人，通過兩次調撤指委，基本清除了「大同盟」分子。改組之後的市黨部，由掌握地方行政權的閻系人員與陳果夫主導的 CC 系共同構成，這既是爲實現「黨政合一」的努力，也是蔣對閻的妥協與安撫，確立的是蔣、閻對北平的共治態勢。隨後，蔣藉助閻的有限度支持與配合，進一步擠壓改組派的活動空間。

北平一地的黨務狀況，反映出南京國民政府初期非核心統治區域政治生態的一些共性特徵。北平多元的權力結構增加黨務工作諸多不可控因素，與國民黨政權統治核心區域江浙一帶相比，中央對北平黨務的掌控力度有限，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蔣、閻關係，閻的態度對於蔣介石整理黨務的成效有很大影響。當雙方利益尚能維持大體一致時，可以攜手對付北平市黨部；當二者關係發生變動，則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國民黨在北平的統治確立之後，中央對北平的黨務整理，既是地方黨務組織系統的重塑，也是新的政治思想的確立過程，相應的是國民黨從「地下黨」到「執政黨」的角色轉型。北平市黨部公開活動後，領導主體仍以青年學生黨員爲主，秉承的是國民革命的理想，對他們而言，「革命尚未成功」並不是一

句口號，而是具有更加現實的意義。因此，他們並未及時調整自身的行爲模式，延續的是國民革命時期的激進政治風格，與國民黨中央的要求並不吻合。從這個角度上說，北平的黨務紛爭不僅是國民黨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競逐，也是國民黨確立執政黨身分後不同政治理念的交鋒。

1928 年京津易幟之後，蔣介石一直試圖在北平進行政治、軍事、黨務的整合。相對於政治與軍事而言，最先收回的是黨務之權。此後，北平的權力結構趨於簡化，但黨務的存在感仍然不強，黨部的邊緣地位未有明顯改善。綜觀整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民黨政權一直未能在北平落地扎根，黨務無法眞正滲入北平基層社會，所謂「黨治」基本處於「懸浮」狀態。國民黨始終面目模糊，北平人士對其缺乏深入的了解與認同，一直視其爲外來政權。進入 1930 年代中期之後，以北平爲中心的華北實際上已經脫離了國民黨中央，成爲具有半獨立性質的地方割據區域。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

國史館藏檔案

《蔣中正總統文物》

〈一般資料－民國十八年（四）〉，典藏號 002-080200-00044-013。

〈領袖指示補編（七）〉，典藏號 002-090106-00007-278。

〈籌筆－統一時期（六）〉，典藏號 002-010200-00006-069。

《閻錫山史料》

〈北伐附晉冀察綏黨政案（一）〉，典藏號 116-010101-0058-137。

〈北伐後之中央政局案（二）〉，典藏號 116-010101-0054-110。

〈北伐華北善後案（二）〉，典藏號 116-010101-0051-125、116-010101-0051-126、116-010101-0051-129、典藏號 116-010101-0051-285。

〈蔣中正日記〉，1928-1929，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輯 119，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河南文史資料》，輯 19，鄭州：河南省政協文史辦公室，1986。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政府．政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錄》，冊 4、6、8，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輯 142，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

朱傳譽主編，《丁惟汾傳記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1979。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4，臺北：國史館，2006。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6，臺北：國史館，2006。

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秦孝儀主編，《革命人物誌》，集 21，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

陳公博，《苦笑錄》，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

陳立夫，《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

葉飛鴻主編，《丁惟汾先生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2014。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
趙麗潔，〈走進商震首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歲月——商震往來信函檔案大觀〉，《檔案天地》，2007 年第 3 期，頁 32-36。

二、報刊雜誌

《大公報》（天津），1928、1929。
《中央週報》（南京），1928、1929。
《中央黨務月刊》（南京），1929。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日刊》（廣州），1926。
《北平日報》（北京），1928、1929。
《民國日報》（上海），1928。
《申報》（上海），1928、1929。
《先導月刊》（上海），1928。
《京報》（北京），1928。
《河北週刊》（北京），1928。
《社會新聞》（上海），1933。
《政治月刊》（上海），1929。
《革命新聲》（北京），1929。
《時事新報》（上海），1928。
《益世報》（天津），1928。
《益世報》（北京），1928。
《國立清華大學校刊》（北京），1928。
《國聞週報》（天津），1928。
《華北日報》（北京），1929。
《順天時報》（北京），1925、1928、1929。
《新中華報》（北京），1929。
《新晨報》（北京），1929。

三、專著

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臺北：國史館，2001。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
楊仲揆，《剛毅木訥的學者革命家——丁惟汾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3。

四、論文

王建偉，〈1920 年代國共合作與國民黨組織在北京的早期發展〉，《社會科學研究》，2021 年第 3 期，頁 167-176。
李文平，〈論「丁家黨」在南京政府建立時期的作用〉，《史學月刊》，2008 年第 4 期，頁 73-78。
杜麗紅，〈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北平工潮與國民黨的蛻變〉，《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頁 60-78。
周斌，〈1928 至 1929 年的反日會〉，《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頁 145-185。
張皓，〈北平臨時分會的設置與撤銷：國民黨各派對華北的角逐〉，《晉陽學刊》，2011 年第 5 期，頁 98-105。
張順良，〈論國民黨中央如何清除各地方黨部的改組派份子（1929-1931）〉，《輔仁歷史學報》，期 21，2008 年 7 月，頁 99-139。
齊春風，〈北平黨政商與濟南慘案後的反日運動〉，《歷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頁 81-103。
蔣永敬，〈南京國民政府初期實施訓政的背景及挫折——軍權、黨權、民權的較量〉，《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頁 80-101。

Dissensions over Party Affairs in Beiping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1928–1929

Wang Jianwei*

Abstract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t Nanjing, the KMT Beiping Municipal Party Headquarters mainly emerged out of several groupuscules from when the KMT operated secretly in North China, hence enjoying a strong characteristic of locality. Although the nine steering committee members were formally appointed by central party authorities, their loose relationship with central headquarters caused an inevitable alienation between the two. From the first day that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was publicized, due to the issues including the registration of party members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MT representatives, the municipal branch confronted central authorities, causing multiple instances of social agitation. In addition, the KMT Reorganization Group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add fuel to the conflagration and further escalated the chaos concerning party affairs in Beiping. Chiang Kai-shek 蔣介石 (1887–1975), who had long taken notice of the situation, took the initiative to gradually seize power over the personnel of the municipal branch, a process of which deeply involved Ding Weifen 丁惟汾 (1874–1954), Yan Xishan 閻錫山 (1883–1960), Chen Guofu 陳果夫 (1892–1951), and others, presenting a complex image. The dissensions over party affairs in Beiping, however, were not merely a local issue, instead reflecting administrative foundations and patterns of governance over North China by the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ir early period.

Keywords: **KMT Beiping Municipal Party Headquarters, Ding Weifen, the Reorganization Group, groupuscule**

*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